

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研究

□ 河北传媒学院 贾燕 高原

摘要 在中国古代,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时期的古代艺术作品中都有马的形象出现,艺术品中马的形象不仅仅反映了当时作家们的艺术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情况。

关键词 汉代泥塑 天马 马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11-10

汉兴以来,出于对外交往和对北方少数民族战争的需要,一直把增加马匹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尤其是在汉景帝和汉武帝当政时期,迫于对匈奴战争准备和作战的需要,养马成为了国家进行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汉武帝时期甚至大力推行马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不仅加强国内的马匹饲养,而且为了改良马种,提高骑兵作战能力还大力从西域(现今中亚地区)引入优良马种,天马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西域东来,中国的马文化也由于天马的引入,增加了诸多的形象元素,形成了以天马为文化元素特点的汉代马文化,这种具有典型的天马形象的汉代马文化在包括雕塑、绘画在内的多种汉代艺术作品中都有不少的体现。天马与汉代马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天马也成为研究汉代各种艺术作品中马的形象不可回避的元素。本文结合天马这一文化图象,就汉代雕塑作品中马的形象作简要研究。

一、天马的由来

据说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在今日甘肃省敦煌附近一片湖泊沼泽中,有天马飞跃而出,为武帝所得。这一传说在李斐给《汉书》作的注解

“伯夷,眼睛不看不好的颜色,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太平就进取,天下动乱就隐退。暴政出现的地方,暴民停留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去住。他以为同乡人相处,就像穿着上朝的礼服,戴着上朝的礼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上。在商纣的时候,他住在北海的海滨,来等待天下清平。所以听说过伯夷的风节的人,贪婪者也会变得廉洁,怯懦者也会有自立的意志。”^{[1]P109}“听到柳下惠的节操的,鄙陋浅薄的人也会变得敦厚,气量狭小的人也会变得大度。他们在百代以前奋发,百代以后,听到他们的的事情的人,没有不为之振作的。”^{[1]P25}

3.加强职业伦理建设。在孟子看来,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对人的善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培育廉洁社会生活方式,必须加强包括职业认同,职业价值取向,职业责任心,职业价值排序为内容的职业伦理建设。在职业认同方面,孟子认为,不同的劳动会导致不同的职业分工,每种职业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1]P16};在职业价值取向方面,孟子以“造箭”与“造铠甲”两种职业之间存在“伤害人”与“唯恐伤害人”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职业取向为例指出:“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孔子说:‘同仁共处是好的。自己选择而不自处于仁,怎能说是明智的?’仁哪,是天设的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稳的宅居。没有人能阻挡,这样还不仁,这就是不智了。”^{[1]P1}孟子还认为,职业伦理建设还包括职业责任心的培育^{[1]P85}。在职业价值排序方面,孟子认为应该赋予脑力劳动职业在职业价值排序当中的最高地位。

4.选拔基层廉官。孟子认为,统治阶级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引领作用具有决定性的^{[1]P104},因而,统治者必须重视自身的言行以及官员的选用。孟子认为,在选用官员方面,要选用那些经历过艰苦条件磨砺

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在敦煌屯田的一个刑徒暴利长发现了野马群中有一匹独特的骏马,他设法抓住了这匹骏马。并把它献给皇帝,之所以有天马从湖中飞跃而出的传说,完全是为了突出骏马的神奇而编造的。《汉书·礼乐志》中《天马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太一天神赐予的天马从天而降,它身沾红色汗水,口吐赭红色的口沫。”由此,可以看出这明显是描述汉代著名汗血宝马的形象。此后,为了得到更多的骏马,汉武帝发动征讨西域大宛的战争。在征讨大宛胜利后将军李广利俘获大宛马罢战而归,由于大宛马比此时武帝拥有的乌孙马更为健壮,武帝甚为高兴,于前101年,亲自命名大宛马为“天马”,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1]。

对于古代人来说无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把天视为至高无上的,统治一切的神灵,而被人们赋予了像天一样具有圣灵之气的天马,自然成为了具有无限感召力的动物实体。而由最高统治者汉武帝亲自赋予“大宛马”以天马的美名,更是将这种西域骏马的感召力推向最高点。以天马作为马的艺术形象原型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绘画和

的,拥有“德行、智慧、技艺、知识”的人。

5.营造廉洁环境。孟子认为,廉洁社会生活方式的培育必须注重营造廉洁的环境,因为在孟子看来,环境对人影响巨大。孟子所说的环境既包括居住环境、心灵环境,也包括社会舆论环境。在谈到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时,孟子说:“居处环境改变气质……居处环境真是太重要了。”^{[1]P89}在谈到心灵环境方面,孟子认为,应该在全社会推崇“道”的价值^{[1]P14}。孟子所谓的道,指的是人对“仁”的遵循^{[1]P6}。在谈到舆论环境时,孟子认为,追求利是人的本性^{[1]P7},因而,不必在舆论中过度宣传。否则,小到自身的祸福,大到国家的政治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孟子》开篇便记述了孟子反对梁惠王言必称利的错误舆论导向^[1]。

孟子的廉洁社会生活方式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廉洁社会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它明确了廉洁社会生活方式培育的目的在于,本质上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对待名、利等相对于人的先天本性之外物的正确态度,而非是要否定外物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其次,廉洁社会生活方式的培育要加大对名利宣传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的评估与监管力度。政府要对刺激人们的非理性欲望,进而造成物质财富“本体化”倾向加大作为力度。再次,政府在对待理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方面,除了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之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尊重理论工作本身的规律性。最后,在干部选拔过程中,重点向那些在基层工作中积累起丰富经验,同时又得到群众广泛认可的,廉洁的基层领导干部倾斜。

参考文献

- [1]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市场经济时代的自我伦理研究,编号:11554205。

雕塑艺术家的共同取向。

二、汉代天马与马的形象分析

1. 汉代马式。所谓的马式其实就是用铜铸造人们认为的良马的式样标准,以便于人们选择良马时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张廷浩在《关于汉代的马式》这一篇文章中指出:汉代马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鉴定马匹各部位发育状况的静态马式,另一种是用于鉴定马匹奔走能力的步样马式。前者以鎏金铜马为代表,后者以青铜天马踏飞鸟为代表。

2. 汗血宝马与天马形象。古代中国的马文化肇端于春秋时期伯乐为当时的秦穆公相千里马。自西汉时期大宛的汗血宝马东来中原,武帝命名其为“天马”以后,以汗血宝马为中心的马文化就逐渐形成,并且成为了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马文化的主要特色。学者们通过对现存的与马造像有关的汉代墓室壁画、木雕青铜、陵墓石雕等不同形制和材质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汉代早期马的造型从形态上来看主要还是体现出乌孙马的特点,而到了中后期,来自西域大宛的大宛马则取代了乌孙马成为了汉代马造型的典范,这种变化与汉武帝对天马的推崇相吻合,同时也给汉代马的视觉形象构建了新的体系。

3. 汉代马式与当时马的造像艺术之间的关系。汉代马式是评价马匹优良与否的静态标准模型,同时也是古代雕塑、绘画等艺术家塑造马的形象的基本形象依据。在汉代这种马式成为了汉代马造像艺术的技术基准,被当时的雕塑工匠们作为造像的基本要素大加推广。汉代的马俑之所以按照良马造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当时汉廷要时常面对匈奴骑兵的不断骚扰,必须要注重良马蓄养。汉武帝依据良马样式在金马门铸马,以此向天下表明政府对良马的重视。早在1981年,在茂陵的从葬坑中出土的鎏金铜马,从其形态来看与今天的阿哈尔捷金马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它是在汉武帝获得西域大宛国大宛马以后按照其原型制作的。并且还可以推论这就是汉代马式。汉代马的造像有很多传世佳作流传至今,全部都是“以马式”为基础,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不同艺术家和工匠们对造像艺术的理解与创造。使汉代马的造像从技术上脱胎于马式但在艺术上高于马式。

4. 汉代不同地域马的造像艺术分析。秦代的俑强调写真,这种造像艺术思想在汉代的青铜马以及雕塑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但是,汉虽承秦制,终究还是有所损益变化,在继承秦代造型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汉代的造型艺术也开创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代特征。更多的主观处理在作品中得到运用,主动的刻画取代了秦代造像艺术中的被动描摹,这从造像艺术思想上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汉代的造像艺术开始出现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后来的汉代陵墓石雕、木雕、玉雕中都有体现。

西汉时期马的造像体现出明显的时期性特点,以汗血马的引入作为区分的标志,在引入前主要以蒙古马或者乌孙马为原型,这种造像原型以霍去病墓、徐州狮子山汉墓以及汉高祖的长陵墓的陪葬坑为典型代表。而汗血马引进后造像形式的发展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汉武帝至西汉末期,这一时期天马造型俊朗紧凑,头部清秀干练,颈部弯曲紧绷有力,躯干结实轮廓硬朗,尾部细长或呈髻状,四肢修长挺拔。以泗水王陵墓葬俑,兴平茂陵鎏金铜马,茂陵陶马为代表^[1]。第二个阶段,东汉时期的马造像在西汉的基础上有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马首表情相对生动和夸张,马的躯干部分更加浑圆,马颈部分更加粗壮,从整体造像上来看既不失西汉马造像中的雄健,同时还多了几分成熟美。这一阶段的马造像以海外的玉马首和陶马俑为典型代表。第三个阶段从东汉末期到魏晋,这一时期在延续东汉马造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诸多丰富的动态姿势,例如对侧快步姿势,但

是时至今日,汗血马都很少出现用对侧步走马的运动姿势,这种运动姿势是以青海高原造门马为代表的中原马的特点,从这一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汗血宝马在引入中国一段时期以后从形象和血统上都已经中国化了。

5. 汉代马造像所表现出的时代风貌及其原因。汉代艺术不仅在秦代写实技艺上有提高,而且对于事物气质特征的把握显得更胜一筹。不是对物象的自然形态进行原样描摹,而是用主观理想化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去塑造生活中的形象,这一变化过程是汉代雕塑在艺术标准和审美上的升华。以天马为基础元素的汉代马形象塑造,呈现出程式化与多样化,开放与保守,自由与约束,浪漫与理性,兼容并蓄的整体时代风貌特点,这既是对各种造型艺术营养的吸收,同时也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中原王朝从西汉开始在武帝刘彻的英明领导下开始进入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张骞通西域以后,热衷西域文化的武帝“闻天马,则通大宛”而随着与西域交流的不断加深,明珠、通犀、龙文、鱼目不断东来。公元60年,汉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西域广大地区开始纳入了汉帝国的广袤版图。在信阳公主墓出土的金铜大宛马以及汉昭帝的陵墓出土的田羊脂玉大宛马,都是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代表,是汉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

自武帝铸马于金马门,向天下宣扬汉廷对良马的重视,一直到东汉仍然延续这一政策,而常年在甘肃活动的东汉名将更是向当时的皇帝进贡铜马式。铜马式的推广,使得遍及全国,陕西、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汉代魏晋时期的雕塑、画像石、画像砖中表现的马的艺术中,体现出汉代马形象甚至马文化与先秦时期的明显的差异。汉代出现了许多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良马法式如立马,铜马式等良马法式的推行,才使得以社会下层为主的艺术家在表现马的形象时能够有法可依,并且有较优秀的作品出现^[2]。

6. 天马在中国传统马文化中的意义。马作为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的一种动物,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本土的马文化,而从武帝时期天马东来汉帝国以后,中国本土原有的马文化吸收了大宛马所带来的诸多元素,一幅以天马东来为基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画卷也由此展开,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从传统马文化的造像范式中脱胎出来,重新形成了以天马形象为基础的新的马文化,并在诸多的木雕、石雕、陶制品以及玉雕等艺术作品中得到艺术家们的青睐,使得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基础蓝本,并为后世艺术家们不断继承和发展,推动了后来不同朝代马的艺术形象的不完善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以大宛马所代表的文化元素为基础的古代中国马文化体系。

马在各种雕塑艺术中的形象与不同时代下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面临着抵御匈奴的军事斗争需要,健壮的马匹对于当时社会来说非常关键,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汗血马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因此成为了汉代马式的标准。而作为异域文化的一个代表,大宛马的引入带来了马文化的变化,尤其是对春秋开始形成的传统马文化的冲击和再造。这种变化反映在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上就体现出多种元素相融合、博大恢弘、兼容并蓄的汉代马文化整体形象风貌。而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使得外来的天马成为汉代良马造型的范式,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马的形象的创作主题,形成了极高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韩晓东. 天马与中国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研究[D]. 中央美术学院, 2013.
 - [2]陈晨. 内蒙古地区岩画中的骑马人形象研究[D]. 郑州大学, 2012.
 - [3]李丹. 汉代马雕塑的造型艺术探究[D]. 北京服装学院, 2012.
-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课题,项目编号:60892YUT2012。